

韩国的 GDP 已达到 1.2 万亿美元,因此美国有可能会借用韩国的力量。其次是澳洲,美国已把澳洲放到东亚联盟体系当中,并且在血缘上,美国绝对信任澳洲。因此在联盟三大支柱中,日本的地位在下降,韩国、澳洲则是上升的。

另外,美国联盟体系除了与日、韩、澳三国搞好关系外,还要加强和新伙伴的关系,即印度、印尼和越南。美国正在推动一个概念,即“印太”就是想把印度拉到其亚太战略中来。印度因其东向战略的考虑而与美国一拍即合。总之,美国在亚太的同盟在三个传统支柱盟友的基础上增添了三个新伙伴。因此,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可能比冷战时期要复杂,从长远看,日本的地位相对下降,将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在联盟体系中处于绝对优先。

在钓鱼岛问题上,我觉得美国的立场是使中日引起争端,但不能引发战争。

我觉得美国有这样一个战略,是准备在军事上把第一岛链交给盟友,自己退缩到第二岛链,用战术进攻来掩护战略撤退。这跟很多军事战略家的结论不太一样,他们觉得美国把 60% 的军力调遣过来,就是对中国在战略上施加压力。美国未来十年军力要减少 10%,在冷战后的 20 多年里,美国不断增加在太平洋的力量,然而实际上目前亚欧的军力已经是 50 对 50 了。虽然未来美国在亚洲再增加 10% 的力量,然而总量要减掉 10%,因此美国的力量支撑不了这个目标。

除了美国因素,中日矛盾还有中国的快速发展改变国际结构这个背景。在大的国际结构里面,中

国是一个新兴大国,是一个改变结构的力量,虽然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和平发展,并且中国是从现存国际秩序中得到好处的,因此在主观上不予改变,但在客观上中国的发展正在改变目前的国际结构,这是事实。中国已经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且发展规模巨大。今天在中国发生的是工业化和十亿人口的结合,其影响也是巨大的。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充分估计这个影响。日本是西方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冲击了西方体系,日本也受到影响。

中国原本是亚洲地区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亚洲原有的地区安全平衡,是建立在中国大而弱的基础上的,从地缘政治的地图上看相当于一个盆地,一个很大的盆地。中国的发展引起了整个地壳的变化,盆地变成了小山包,周边国家对中国从俯视变为平视,未来还可能仰视,因此中国不做任何事情,它的发展本身已经改变了东亚的地缘地图,周边所有国家都感觉到了震撼。日本作为邻国,受到的影响必然很大。

关于对策,我有几点想法。首先,控制危机。在钓鱼岛问题上尽量避免冲突,不要打仗,要平息危机。双方政府要起作用,不刺激对方,把危机淡化下去,控制舆论的热度,政府间应该互通,想办法把问题淡化下来。此外,职业外交官也要保持沟通。其次,在外交上要稳定中美关系,发展中日民间交往,寻找环保、能源、打击海盗、救灾等方面的全球问题合作。最后,要有一定的军事威慑准备。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院长、教授

中日民间交往的形势与任务

杨伯江

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引发中日关系危机,包括民间交往在内两国之间的正常往来受到严重冲击。但从战略上看,中日民间交往仍大有可为,而且越是

形势复杂,民间交往就越有发挥作用的空间。现在需要做的是,准确评估中日民间交往的作用及其面临的问题,使之不断完善,更为有效。

一、中日民间交往大有可为

首先,民间交往是由时代背景决定的。我们处在国家关系空前丰富、相互依存空前密切的时代,国际竞争集中体现在综合国力与战略的竞争上,市场、资金、社会、观念、民意等非政府、非政治性要素对外交决策及国家关系的影响凸显。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外交专责部门无法做到事无巨细,包揽一切涉外事务,因此民间力量的补充成为必然。

其次,民间交往是由东亚地区的特点决定的。任何地区的国际关系都具有历史延续性,这一点在东亚体现得尤其明显。现代国际关系发端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在东亚特别是东北亚,非现代意义上的地区性国际关系在距此一千多年前就已存在,即华夷秩序。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地区性国际关系更多地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更多地受到人文因素、各国国内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民间交往一直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大特色。

第三,民间交往是由中日关系的特点决定的。周恩来总理曾以“两千年友好,五十年不幸”描述中日关系,这是作为政治家、战略家所做的高度概括,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在1894年到1945年的这“五十年”间,中日之间有过多次战争,更有相互隔绝的历史。日本对华夷秩序,或侧目旁观,或正面挑战。二战后日本迅速纳入西方冷战阵营,与中国相互隔绝27年。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又是在特殊的国际背景以及异于今日的国内政治背景下实现的,“政府主导”的色彩很强。

其实,中日两国有史以来极少处于同一个国际秩序框架下,缺少平等、对等交往的历史经验,在不少方面“似近而远”,互知不足,误解不少。到全球化时代,国家合作型关系的建立必须以主流民意为基础。因此,中日两国需要为历史补课,通过民间交往推动社会交往,实现从“国交”(外交关系)阶段向“社交”(两个社会之间交往)阶段的迈进。

二、中日民间交往面临新挑战

首先,中日两国关系进入战略碰撞期,在国家目

标、地缘政治、地区主导权等方面都存在分歧。2010年以来日本两次外交危机都出现在中日之间,都因钓鱼岛而生,有其必然性。本质上,中日之间的首要问题不是沟通问题或感情问题,而是涉及战略利益等的“硬性”问题。在此背景和前提下,民间交往面临着如何发挥作用的挑战。

其次,中日两国国内情况较过去已大不相同,经济、社会正在经历结构性变化,政治在转型,利益、价值观多样化发展趋势明显,使外交政策寻求主流民意支撑的过程变得更为复杂,而且对如何能够完整、及时地汲取各个社会群体的不同诉求,准确无误地传递给本国政府及对方国家构成了挑战。

第三,实施民间交往的行为主体需要与时俱进。无论是体制、机制、职能、架构还是工作运营模式,都需要根据时代要求与形势变化进行自我改变、自我完善,既要保持“草根”的代表性,又要保证政策参与的有效性。

三、民间交往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首先,民间交往应该不仅仅是防御性的、灭火型的,也应该是战略性的、进取型的。在特殊时期或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固然重要,但唯有制度化交往、持续性经营才能治标治本、未雨绸缪,才能保证在特殊时期、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在日常交往中稳定局面。

其次,不仅面向精英,也要面向“草根”,对上也对下。中日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型关系,基础在民间,民间是实施主体之一。只有夯实民间基础,中日关系才能实现内生性、自律性发展,而不是单纯依赖“政治主导”。结合当前形势,安倍内阁一面否认历史,口称“侵略定义未定”,一面推行“价值观外交”;一面借口岛争以强军,一面奢谈中日高层对话。要戳穿安倍外交的这种欺骗性,中国民间大有可为。应当及时地、积极地向国际社会和日本民众宣传,帮助各方了解中方的正义立场,认清安倍路线的危害性。

第三,不仅面向对方,也面向国内,在两国、两个社会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民间交往不仅围绕具体议题展开,更要注重观念的渗透。中日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是中国对整个周边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的一部分,必然要与中国社会进步、国际观进化的历史进程同步,必然要在中国真正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历史上,无论春秋战国时代的“纳质为押”,还是中世纪欧洲的政治联姻,本质上都是借助相互利益来增强国家间关系的稳定性。反观今日,全球化背景下,“质子”无所不在,国家间利益的互

持、互融程度前所未有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关门搞发展,也无法靠对抗保安全,既不能独自存活,更无法独自繁荣,而只能在与他国特别是邻国的深度合作、共同发展中实现自我发展。

本文作者: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中日友好主流民意的强化和构筑

曲德林

随着2013年7月21日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果的揭晓,自民党与公明党执政联盟在121个选举席位中共获76席,加上非选的59席,共达到135席,大大超出议席半数。从此,结束了朝野分控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的政治形态。安倍政权从此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除非自民党内和联合执政的公明党抵制和提出反对。换句话说,安倍在执政过程中,只要对外不过于得罪美国,对内坚持国民看重的经济复苏和改革的成果,基本上就不会发生重大的政治变故,安倍至少可任满三年的首相任期。也就是说,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日本右倾保守政权。

面对安倍政权长期化,如何应对右倾保守政权,是对中日关系定位和走向分析的基础。安倍政权在执政后,一直维持着日本政局少见的高支持率,主要原因:一是安倍政权力主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日元大幅贬值,从而扩大和刺激了出口,使日本经济出现正增长的复苏态势。被媒体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给20多年来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打了一剂强心针,起到了汇集民意的作用。二是日本长期的政治诟病,“短命”的内阁,频繁的首相更迭,使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不能推行下去,更使经济增长雪上加霜。民众对民主党政权的执政表现不满,主流民意希望自民党能成为一个稳

定的政权。安倍政权右倾保守倾向迎合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意愿,否认侵略历史,在领土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特别是对内、对外渲染“中国威胁论”。在2012年的《防卫白皮书》,以及对东南亚诸国的外交中视中国为对立方,妄图与和中国发生领土主权争端的国家一道厄制中国,使日本与中、韩的关系变得紧张,外交上处于焦头烂额的境地。在参议院选举结束之后,安倍力图打开日本外交的僵局,承认中日关系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并表态随时准备与中国对话,然而如果他不改变极右的历史观,不承认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领土争议,中日间的政治关系在短期内将难以发生转变,《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之际也难以在政治层面上发生实质性的改观。

安倍在参议院胜选后,急于要做的两件事,一是恢复经济,提高经济实力,改善民生。这就牵扯到“安倍经济学”能否走下去,能够走多远的问题。第二件事是修改宪法,企图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实现集体自卫权的行使。美国出于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需要,抑制中国的影响,增强美日同盟关系,实际上对日本修改宪法第9条(这项条款剥夺了日本发动战争的权利,并对日本发展军事力量进行了约束)持支持态度。此外,日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6条,该条款规定对宪法的任何修改都须参众两院2/3以上议员的同意,之后还要进行全民投票